

列 宁

卡尔·马克思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新历5月5日生于特利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后,先入波恩大学,后来入柏林大学,研究法学,但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出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按其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黑格尔左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小组,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不准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褫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权,这就使马克思不得不抛弃做学者的志愿。当时黑格尔左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又有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出版。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必须亲身体验”这些书的“解放作用”。“我们<即黑格尔左派,包括马克思>①一下子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②这

时，同黑格尔左派接近的莱茵激进资产者，在科伦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伦。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趋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两三重检查，以后决定干脆要在1843年1月1日将其查封。这时，马克思只好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了。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大篇论文，除后面列举的（见参考书目③）以外，恩格斯还指出了论摩塞尔河谷酿造葡萄酒农民状况一文。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时代就同她订婚了。燕妮出身于普鲁士一个反动的贵族家庭，她的哥哥在一个最反动的时期（1850—1858年）当过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到了巴黎，以便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黑格尔左派分子，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亡命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杂志《德法年鉴》只出过第一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又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④；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① 本篇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是列宁加的。——编者注

②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选集第4卷第218页）。

本篇和下一篇中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均按列宁引用的俄译文译出，其中个别地方与原文稍有出入。——编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72页。——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1843年9月给阿·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本卷第9页）。——编者注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到巴黎住了几天，从此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极其热情地投入了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起着特别作用，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哲学的贫困》一书对它进行彻底的清算），并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创立了**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参考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马克思被视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而逐出了巴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出色地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三月革命后，他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的科伦。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任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变进程光辉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都证实了它。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去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后又被逐出巴黎，于是他移居伦敦，直到逝世。

侨居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出版）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

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小资产阶级和一般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占着上风，所以马克思不得不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最疯狂最野蛮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①。马克思避开侨民小组，写了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阐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1卷）两书中，使这门科学革命化了（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反对所有这些宗派和学派的理论，从而为各国工人阶级锻造出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巴黎公社失败（1871年）——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作了一个极深刻的、准确的、出色而起积极作用的、革命的估价（《法兰西内战》，1871年出版）——以及巴枯宁分子使第一国际分裂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以后，马克思便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编者注

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尽管如此，他还是收集大量新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文），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夫人逝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他的安乐椅上静静地长眠了。他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葬在一起。当家境十分贫困时，马克思有几个孩子在童年时代死于伦敦。三个女儿嫁给英国和法国的三个社会主义者：爱琳娜嫁给艾威林，劳拉嫁给拉法格，燕妮嫁给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因此，我们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前，必须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简略地叙述一下。

哲学唯物主义

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特别是一个拥护路·费尔巴哈的人，就是在后来他也认为费

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不够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在法国，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斗争”（《遗著》中的《神圣家族》）。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创立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明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或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认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我们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某种观念的反映。”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①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

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是精神先于自然界,还是自然界先于精神……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先于自然界,从而归根到底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至多是“把当众逐出的唯物主义羞答答地从后门放进来”。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指出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说过的比通常“较为唯物主义的”言论,及其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离开唯物主义立场”的说法,而同时又斥责赫胥黎留下了逃往不可知论和休谟主义去的“后路”。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也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

① 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选集第4卷第210—254页)。——编者注

“庸俗”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时还应加上物质电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3)旧唯物主义者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辩 证 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们认为，其他一切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当时几乎只有我和马克思两人决心拯救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证物，并且正是现代自然科学表明这种证物异常丰富(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呵!)，每天都提供大量材料，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

个个别场合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都带有必然灭亡的迹象；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任何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时，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所表述的这个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比通常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参看马克思 1868 年 1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

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道：“工艺学会揭示出人类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周密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

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参看马克思 1866 年 7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

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阶 级 斗 争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灭亡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

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设立代议机关、实行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创办深入群众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联合会等等出现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用客观态度去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并且同对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

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就从商品的分析着手。

价 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重复亿万次的交换，使得千差万别的不能相比的使用价值经常彼此相等。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经常彼此相等的这些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在交换产品时，使各种不同的劳动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下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种形态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

某一社会内表现于所有商品价值总额中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人类劳动力，亿万次的交换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个单个商品只表现某一部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一位旧经济学家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只是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某个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从表现在重复亿万次的大量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的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单个的偶然的交换行为起（“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交换），直到一般价值形式，即几种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交换，以至货币的价值形式，这时金便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各个生产者通过市场所发生的社会联系遮蔽和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且在这里（如同在《资本论》的前几章中一样）也特别应当指出，这里所作的抽象的、有时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的一定发展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如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者流通手段，或者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照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

着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资本论》第1卷)

剩 余 价 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变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T(\text{商品})——M(\text{货币})——T(\text{商品})$ ，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 $M(\text{货币})——T(\text{商品})——M(\text{货币})$ ，这就是说，为卖(加上利润)而买。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殖额叫做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变为资本，即变为一种特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不过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间的盈亏必会抵销，并且这里所谈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要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种商品确是有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由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强迫他整天做工，譬如说做十二小时的工。其实工人在六小时内(“必要”劳动时间)就能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六小时内(“剩余”劳动时间)则创造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看来，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一

部分一部分)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增殖起来,因为它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要说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较,而只应当同可变资本相比较。这种比率,马克思称做剩余价值率,按上述例子来看,就是 $6/6$, 即 100% 。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两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一方面他们出卖劳动力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脱离土地和脱离任何生产资料,这是无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分析第一种方法时,描绘了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政府为延长工作日(十四至十七世纪)和缩短工作日(十九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事实。

马克思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是如何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就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丰富的材料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都显示出来了。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资

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变为资本，不是把它用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奢侈，而是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所有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在于认为变成资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作可变资本。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较快的事实，有巨大的意义。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其表现形式极其纷繁，使资本有可能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就给了我们一把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钥匙，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相隔的时间则比较长，比较不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原始积累就是强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霸占村社土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

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而将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I）生产资料的生产和（II）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来详细考察社会总资本在实现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和实行积累时的周转情形。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解决了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全部社会经济来分析问题，而不是象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限于分析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剩余价值分为利

润、利息和地租的情况。利润是剩余价值和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的”资本（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而“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价值总量是与商品价格总和相等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它的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的价格**（或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个众所周知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就为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量是与价格总和相等的。然而价值（社会的）转化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道路，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道路，因为很自然，在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各个分散的商品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社会内**，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较快。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和全部资本之比，不只是和可变资本之比）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掩盖或阻碍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去转述《资本论》第三卷中专论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等饶有兴趣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全被各个业主占有，面积有限，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

就产生等差地租或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于是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优等地相继变为劣等地而产生的。相反地，也有倒逆的改变，也有某一类土地改变为另一类土地的事实（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一切工业部门和一切国民经济部门中利润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完全自由，是资本能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资本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作为垄断者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于是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化为国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化就是摧毁私有者的垄断，在农业中比较彻底和完全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切近地“触犯”现代另一种特别重要的和“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的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3卷第77—81页。并参看1862年8月9日的信，同书第86—87页。）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指出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变过程的分析：劳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变为产品

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其交给地主），然后转变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变成货币，在旧俄称为“代役租”），最后转变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起源”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进化的许多深刻的（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在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中，不仅必然同时形成受货币雇用的无产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变之前就已形成这个阶级。在短工阶级已产生而还只是个别现象的时候，那些较富裕的缴纳代役租的农民自然而然就养成一种自己剥削农村雇佣工人的习惯，正如封建时代富裕农奴自己也有农奴一样。于是，这些农民便渐渐有积蓄起相当的财产而变成未来的资本家的可能性。于是，那些独立经营的旧土地占有者中间就渐渐产生出资本主义租佃者的苗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业范围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32页）“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 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农土地占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低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低价(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困的结果,而决不是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高的结果。”(《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土地私有制,即小生产的通常形式,不断衰落、消灭以至灭亡。“小土地私有制实质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的日益广泛采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不可避免地处使小土地私有者陷于贫困。把资本用来购买土地,便不能用来改善土地的经营。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农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大量消耗。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土地私有制的规律。”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

改造生产过程的。“农村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提高了这种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枯竭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以会发展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的联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着一切财富的泉源——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

社 会 主 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向前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半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在智慧上和精神上推动这个转变、在体力上完成这个转变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它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完全割断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为这种联系准备新因素，使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其基础是自觉地运用科学，集体劳

动的联合,人口的重新分布(一方面消灭农村的偏僻状况、与外界隔绝和未开化状态,另一方面消灭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内,女工和童工的使用,父权制家庭被资本主义瓦解,必然要通过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恶的形式。可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的形式建立起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也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或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序列。显然,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粗野的资本主义形式(在那里是工人为生产过程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存在)上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道发展的泉源”(《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工厂制度向我们表明“未来时代教育的萌芽,那时对于所有超过一定年龄的儿童,生产劳动将同教学及体操结合起来,这不只是一种扩大社会生产的手段,而且是生产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手段”(同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虽然这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完全是一个真理:“工人没有祖国”,至少

各文明国家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各个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控制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控制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建立联系,直接或间接收买官吏和报刊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剥夺生产资料以利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调节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最后,谈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会存留的小农的态度问题时,必须指出恩格斯说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

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这种转变的一切好处。”①(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也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马克思在1844—1845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不能了解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评价革命实际活动的意义,他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一切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为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材料还远未收齐、综合、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作最一般最简短的说明,同时着重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

① 见《法德农民问题》(本选集第4卷第310页)。——编者注

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①。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机，无产阶级的策略都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龟行的发展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达到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共产党宣言》上论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这必须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作出的许多指示：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工

^① 见马克思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本选集第4卷第348页）。——编者注

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①、使工人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败坏工人的意识”(第2卷第218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②;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毅力”(第3卷第124页);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宪章派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③;英国工人领袖是怎样按“介于激进资产者和工人中间”的样式造成的(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当这种垄断地位尚未破坏时,“对不列颠工人是毫无办法的”(第4卷第433页)^④。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用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把它和工人运动的全部进程(和结局)联系起来观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

① 见恩格斯1851年2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见恩格斯1857年12月17日、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本选集第4卷第338页)。——编者注

③ 见恩格斯186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本选集第4卷第348页)、马克思1866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④ 见恩格斯1869年11月19日、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实行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间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被世界风暴吓得魂不附体；在在显得无力，处处实行抄袭；……没有首创精神；……该死的老头子注定要为自己晚年的利益而领导年轻力壮的人民的青春热情的首次迸发……”（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①大约过了二十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一觉察到将有争取自由的斗争发生，就宁愿去同奴隶制媾和。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做法（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究竟怎样要求进行这种工作，这可以从他对1856年德国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情况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②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马克思当时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的利益而背叛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也正是因为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

^① 见《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本卷第323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本选集第4卷第334页）。——编者注

恩格斯写信同马克思商量他们将在刊物上共同发表意见的问题时说道：“在一个农业国家里，代表工业工人说话时只攻击资产者，而忘记了封建贵族对农村工人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① 1864—1870年间，当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时代，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了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相互斗争的时代快告终结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思想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无论对俾斯麦或亲奥派都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要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要在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基础上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②。在1870年9月9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宣言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发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害处，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少些，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精神颓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消沉和资产阶级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

① 见恩格斯1865年1月27日和2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见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3年6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63年11月24日、1864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4年1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65年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5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67年10月22日和12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7年12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会党人非常法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暂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采取不合法斗争手段的决心来对付非常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①，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写于1914年7—11月

1915年第一次载于《格拉纳特
百科全书》第7版第28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1卷
第28—58页

① 见马克思1877年7月23日和8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79年8月20日和9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79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